

拉美新聞分析

民主政治未實現 「拉美十年」路難行？ 向駿，致理技術學院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

日前國際媒體及學者在紀念「九一一事件」十週年的文章中指出，二〇〇一至二〇一一年是美國「失落的十年」。《金融時報》專欄作家史蒂芬斯(Philip Stephens)認為，此期間真正重要的改變在於亞洲與拉美地位的崛起。印度及中共的國際影響力日漸展現，國人感受較深，但拉美地區的現況卻顯得陌生，因此，本文將探討拉美地區近年來的崛起。

華盛頓共識 VS.北京共識

去年九月，《經濟學人》以「不屬任何人的後院：拉丁美洲的崛起」(Nobody's Backyard: The Rise of Latin America)為封面故事，在特別報導中更提出「拉美十年」一詞，但在後面加了個問號(A Latin American decade?)。然而，美洲開發銀行(IADB)今年三月一篇題為《一個地區，兩種速度》(*One Region, Two Speeds?*)的報告指出，未來拉美地區可能享有空前有利的外部環境，進而提供所謂「拉美十年」的發展契機。八月中旬，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(Juan Manuel Santos)在拉美暨加勒比經濟委員會(ECLAC)中更堅稱一定會有「拉美十年」。以下從國際關係、區域經濟和國內政治角度，探討其可能的發展。

二〇〇一年十一月，高盛集團首次提出包括巴西在內的「金磚四國」一詞時，四國的經濟規模僅占全球百分之八，如今已近百分之二十。今年拉美地區的經濟成長將達百分之四點七，預估明年經濟平均成長百分之四點一，如此亮麗成績的背後，中共扮演舉足輕重角色。

近十年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，原物料充足的拉美地區抓準商機，經貿聲勢水漲船高，加上金融海嘯對美國經濟霸權的國際地位產生動搖，拉美轉而尋找「華盛頓共識」的替代品--「北京共識」。若以簡略的二分法劃分，可說「華盛頓共識」的核心是震盪療法，「北京共識」則是漸進改革，前者反映國際金融貨幣組織的信仰，後者是在中國大陸地區通過檢驗的實踐產物。

去年初，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、老布希總統的國安幕僚哈爾珀(Stefan Halper)在其《北京說了算？》(*The Beijing Consensus*)一書中指出，「北京共識」比「華盛頓共識」對發展中國家更具吸引力，因「華盛頓共識」奠基的新自由主義受挫，世銀、IMF等組織已無法提供符合受援助國家所需的改革與支援。去年二月《經濟學人》在「面對中國」(*Facing up to China*)一文中更指出：「隨著西方的衰弱，許多中國人現在覺得沒有必要向西方學習，導致讚頌威權果斷的『北京共識』勝過民主的猶豫不決。」但中國大陸的模

式真的學得來嗎？

資本主義 VS. 社會主義

八月上旬，聯合國拉美暨加勒比經濟委員會(ECLAC)執行秘書巴爾塞娜斯(Alicia Bárcena)在「全球管理中的聯合國」(The United Nations in global governance)研討會上指出，金融資本主義正走向自我破壞的邊緣，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應當適應新的現實。儘管資本主義在拉美地區似乎受到嚴重質疑，但對社會主義能否取而代之，仍普遍存疑。

近十年來，拉丁美洲受到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(Hugo Chávez)多次選舉成功影響，民粹風潮高漲，從巴西的魯拉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到阿根廷的柯許納 Néstor Carlos Kirchner 當選總統都受益於查維茲的影響，但查維茲推動的「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」卻是個失敗的案例。因石油而累積財富且好大喜功，查維茲上任後不僅在國內推展多項計畫，更在拉美地區聚眾與美國抗衡，過去五年來用於「玻利瓦替代計畫」的金額高達六百億美元。

但查維茲大肆揮霍的結果，導致委內瑞拉成為拉美通膨最高、經濟成長最低、糧食短缺、高犯罪率的國家，更不可思議的是今年六月起開始，自哥倫比亞進口電力。難怪曾獲普立茲獎的拉美專欄作家歐本海默(Andrés Oppenheimer)諷刺「查維茲有功於經濟奇蹟」；被譽為當代思想大師的美國學者喬姆斯基(Noam Chomsky)雖為查維茲好友，不久前也譴責他對民主的攻擊。

今年七月底，接任秘魯總統的烏瑪拉(Ollanta Humala)，其從政經驗最能反映「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」的成敗。二〇〇六年烏瑪拉競選總統時曾獲查維茲公開支持，但被認為是干預秘魯內政，烏瑪拉因此敗選。今年秘魯大選期間，烏瑪拉為掃除各界擔憂他若當選，將採取和委內瑞拉相同經濟模式的印象，公開在電視上表示：「我承認自己犯了錯，我們想改正錯誤，因為這才是政治家該做的事」，選舉結果也證明了和查維茲切割確實有效。因此，資本主義雖已呈現疲態，但社會主義未必就能取而代之。

民主發展 VS. 威權遺緒

一九八七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哥斯大黎加前總統阿里亞斯(Oscar Arias)認為，拉丁美洲發展進程的一大障礙是「對民主承諾的脆弱性」，亦即仍受威權主義牽制。阿里亞斯並表示，拉美民主從未完成，因為「我們虧欠獨裁統治的受害者，那些在二十世紀用鮮血撰寫悲慘史頁的人；我們虧欠受壓迫和折磨的倖存者，我們虧欠那些親身經歷軍事統治恐懼的人」，換言之，就是未能嚴肅面對「轉型正義」的問題。

今年四月初，美洲開發銀行行長莫雷諾(Luis Alberto Moreno)在《金融時報》撰文指出，拉丁美洲要從「失落十年」邁向「拉美十年」，所採取的四個具體措施之一是「建設一個更為永久制度框架的同時，迅速建立能夠傳達民眾要求的臨時政治進程」，如智利、烏拉圭等國舉行全民公投或成立「真相委員會」以解決侵犯人權問題。

拉美各國因歷史背景與政經環境不同，「轉型正義」的實踐結果也互異，其中從軍政府轉型為民主體制者，只要繼任的文人政府具備決心，是可有效處理「轉型正義」的問題，如阿根廷、烏拉圭等。但智利皮諾契直到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日過世前，並未受到法律的實質制裁，成為實踐「轉型正義」的憾事。

更難處理的是瓜地馬拉身陷內戰長達三十六年，至少二十萬人因戰事喪生，根據聯合國支持的真相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的調查報告顯示，政府部隊應為其中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員死亡負責；今年七月，瓜國原住民組織致函聯合國，控訴總統候選人裴瑞斯(Otto Pérez Molina)曾參與一九九二年基切(Quiché)侵犯人權案，由於「轉型正義」的對象除裴瑞斯外，其他大部分都是其軍中舊識，瓜國下個月舉行的第二輪總統決選，若裴瑞斯當選，要他公正面對「轉型正義」恐難如登天。

結語

基於前述分析，區域經濟的躍進不能僅由經貿層面著眼，國際政治的角力、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、民主意識與威權統治的消長，皆左右拉美地區的經濟走向；因此，「拉美十年」四個字之後似乎應加個問號，此一理想能否實現仍應持續觀察。

註：本文已刊登於，向駿，《青年日報》，2011年10月14日，7版。